

黃季陸先生著

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

國史館編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

（本文原載五十八年十全大會「每日快報」）

中國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臺舉行開幕典禮，自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大會在廣州集會，到現在已是第十次大會的召開。從第一次到第十次我都是出席人員之一，就個人而言可以說得上是一件幸運而值得回憶的事。

一、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

我於民國十二年的冬天，當選國民黨加拿大總支部的代表，回國參加民國十三年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時我尚是二十餘歲的青年，轉瞬間我已是七十歲的人了，時間過得多麼快呀！

從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算起，到民國五十八年的今天，恰好是四十五個年頭又兩個月零九天，當時出席第一次大會的代表今日尚留在臺灣的僅有張知本、孫科、李宗黃、白雲梯、李肖庭、苗培成、延國符諸先生和我八人，年齡最長的有九十初度的張知本先生，八十初度的李宗黃先生，其中最小的要算是我和延國符先生，然已是坐七十望八十之年了。

我從民國十三年參加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五十二年參加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間、地點自然變易，參加的人亦年有不同。但在每一次的大會期中，每當會前會後我坐在大會場裏，向主席臺注目凝視，總理的笑貌聲音却仍時時重現在我眼前耳際，彷彿我又重回到民國十三年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彷彿我又回到我二十餘歲的青年時代。可惜，這景象不是夢境，因它不如夢境般長，而只是一時的幻象，是那麼短暫，待我稍一清醒，我所仰望的仍是主席臺上高懸着的總理莊肅的遺容。最使我百感交集的是在主席恭讀總理遺囑時聽到「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段，這是中山先生臨終所交給我們的任務，其中我們還有若干至今尚未完成的，而我又是一次大會時的宣言審查委員之一，怎能不引起無限的慚感與追思！

總理中山先生是民國十四年離我們而去的，到今天亦快四十四年了。

此次十大大會召開的使命是什麼？是大家最關懷的一件事。在我看來，此次十大大會的使命，雖然由於時勢的推移，今昔有所不同，而在革命的總目標上則仍是第一次大會總理交給我們的使命的繼續。

二、令人難忘的中山先生開幕詞

在我的記憶中，總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典禮的訓詞，就是一次對我們最剴切而難忘的革命使命的指示。他說：「這次大會是本黨民國以來的第一次，是我們幾十年來革命黨人流了許多熱血和心血，犧牲了無數的聰明才力換來的日子。」

大會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開幕，所以他說：

「革命黨推翻滿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湖北武昌，那天的日期是陽曆十月十日，是一個雙十日，今天是民國十三年的一月二十日，又是一個巧合的雙十日，所以這個會期與武昌起義的日期有同樣的歷史意義。」

大會代表聽了這段話之後，頓覺心情開朗而愉快，說到此地，他的語音忽又轉得很沈重的說道：

「過去革命失敗的最大原因，是當時革命黨人外面見到外國的富強，中國衰弱，被人凌辱，內面受到滿清的專制，做人奴隸，幾幾乎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革命黨人發於天良，要想救國救種，便非革命不可，但革命何時成功？成功以後究用何項具體計劃去建設國家，大家都不加注意，只憑各人良心的驅使，不計成敗，不惜犧牲去奮鬥，所以造成各自為戰，沒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的局面。辛亥雖推翻了滿清專制政體，然到今日民國成立了十三年，革命仍無結果，仍然是失敗！所幸我們現在還有廣州一片乾淨土，有機會來集合海內外同志聚集一堂，共商今後革命的大計。我們從前沒有想到召開這種全國代表大會來研討革命和黨務進行的重要，是因為我們受了滿清官僚餘孽的欺騙。辛亥武昌起義因為革命成功得太快，從前反革命的官僚，也偽裝成革命黨，滲透到我們黨裡來，一部分同志受了官僚的包圍，中了官僚的毒素，便種下了我們革命失敗的總因！」

總理說到此時，態度顯露出十分的嚴正。他一再的反覆重述：

「這是我們過去失敗的總因！這是我們過去失敗的總因！」

總理的聲調頓然宏大起來。然後他又從容的繼續說道：

「官僚拿什麼來欺騙我們呢？他們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既然革命黨消，便只有官僚和軍閥的世界，沒有革命黨人的立足點了！到了今天我們才覺悟了，我們才知道這句話的危險，所以我們今天要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成。』來恢復我們革命黨的精神，來挽救從前的失敗。我們要改造國家：第一要有一個堅強的革命黨

；第二要有很正確的共同目標。從前我主張以黨治國，現在想起來實行這句話爲時尚早。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紛亂，社會還是退步，所以我們國民黨今天的責任還是要先以黨建國，才能說得上以黨治國，國都建不起來，何能求治？現在中華民國的國基尚未鞏固，我們必須要另下一番功夫，把國家再造一次。這個把國家再造一次，使國基鞏固起來，便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他又說：

「我們這次的大會不是尋常的懇親大會來聯絡感情，不是尋常的討論來議決例行事件，而是把我們幾十年來所得的經驗和發明的種種方法，在此國內外情勢大有可爲的時候集海內外同志代表，把這些經驗和方法提出來供大家採納。我們在大會之前已經組織了一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做了一番準備的工作，自今天起要把籌備的各項方案計劃，逐日提出來供大家討論研究。要大家贊成這些方案帶回去實行，那麼，本黨一定發展，革命一定可預卜成功！」

總理說到這裡，以很重的語調，總結此次大會改組的意義：

「第一是把本黨改組成一個有組織、有紀律、有力量的革命黨；第二要用本黨的力量去改建中國。」

「除了上述兩件事以外，另有一件大事要大家特別加以警惕，那就是本黨從前不能成功的原因，不是敵人有什麼大力量來打破我們，而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我們此後要團結一致，把自己的聰明才力貢獻到黨內來，不可歸個人所用，要歸黨內所用。大家團結起來爲黨爲國，爲同一目標爲同一步驟而奮鬥！革命成功最要緊的條件是全黨同志精誠團結，團結的要義是：第一要犧牲個人自由；第二是要貢獻能力，然後全黨才能有能力的，等到全黨有了自由有了能力，才能擔負革命的大事業，才能改造國家，實現國家的自由。本黨以前的失敗是各

個黨員有自由，全黨無自由，各個黨員有能力，全黨無能力，我們今日改組便要先除去這個毛病。我們應當反省，應當補過，爲今後的革命成功而奮鬥！」

聽衆以感慨奮勉的心情，聆聽總理的講話。

這時整個會場如嚴冬深夜那樣靜寂，而每個人內心，則燃燒得像火一般的熱烈，最後爆發了如雷的掌聲，經久不歇。

這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時對大會使命的剴切訓示，在四十五年後的今日，我們重溫上述訓示，雖然今昔情勢有所不同，而十全大會的使命與努力，在革命的總目標上，仍將是繼續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精神，以完成總理未竟之志業的。

三、大會宣言審查委員的提名

——一個不被重視的年輕人——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以後，當日下午繼續舉行大會，由中山先生提名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等五人爲大會主席團主席，經大會通過後，旋即提出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人選案交由大會討論。中山先生主張宣言審查委員會人數爲九人，由大會選舉。經過討論之後多數代表均不贊成由選舉方式產生，主張授權總理，請他指定。很顯然的當時會場中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心理，由於代表中有一部份是新近加入的共黨分子，在他們來說，如果選舉，恐怕他們是不易當選的。在老一輩的代表中，也許顧慮青年人不會選舉

他們，而又自許追隨總理多年，黨齡悠久，如果由總理指派，他們當然希望很大。由於這兩種心理，不期然而然的，都共同主張由大會授權總理指派。

中山先生在考慮審查委員九人的人選時，自然必須考慮到老同志和本黨青年與共黨加入本黨的份子，以適應當時的事實。因此他提出了以下九人爲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

胡漢民、戴季陶、葉楚傖、茅祖權、李大釗、恩克巴圖、王恒、黃季陸、于樹德。

胡、戴、葉、茅、王五人爲本黨老同志，李大釗、于樹德爲著名的共黨分子，恩克巴圖爲蒙古代表，似乎被認爲是與共黨份子較爲接近。我本人的被提名，可能要我代表青年，或者因爲我是加拿大選出的代表，要我代表海外的黨部參加。可笑的是當總理把九人的姓名唸出時，對其他的人，大家都無異議，惟獨唸到我的名字黃季陸時，會場中竟有「不知道」或「不認識」之聲數起，我細看這些說話的人當中，有年歲較長，且有與我相識的同志，使我感到有些驚異和不安。我那時雖然年紀輕，但我的黨齡却不後人，不知道的人似乎很少。這一反應大約是他們原都自以爲有被總理指派的可能，而卻沒料到總理會指派出這樣年輕的我。初出茅廬，便受到這樣的一項挫折，當時是很感有些困擾的。最可感的是中山先生，他馬上叫我站立起來，特地把我向大會介紹一番，大家才默然無言。

大會宣言的初稿，是由總理事先準備，經由大會前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交大會討論的。在起初的一般問題上，還不覺得九個審查委員之間有什麼特別不同的主張，分不出國民黨和跨黨份子之間，劃有什麼鴻溝，却是到了後來討論到宣言和政綱的重要問題上情形就兩樣了，我們與跨黨份子之間便頓然發生理論與政策上壁壘森嚴的現象。爭論爆發點表面上是在民生主義的觀點的差異，而實質的問題則完全在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方面，國民黨

員和跨黨份子間有根本不同的觀點和立場的存在。

四、宣言審查委員會的陣容

李大釗、于樹德二人在宣言審查會中發言不算多，但是態度却一致而堅定，討論問題的時候，很少有自發積極的主張，但却時時利用國民黨同志間對某一問題正反兩種意見尖銳化的時候，他們總是倒在一方，壓倒另一方，這樣常常使我們自己同志之間留下不快之感，而跨黨分子反而常爭取到了友軍。此種情形屢試不爽，這原是共產黨滲透分化別人，瓦解別人的一套法寶，他們並不在乎一定要馬上拿出他自己的主張來，使別人注意和防範。因為他們的目的先只是在滲透，擾亂你而已，到了你已經分解了，陣容混亂到沒有力量的時候，他的真手段才全套拿出來，使你防備不及也後悔莫及。畢竟李大釗、于樹德二人還有一些書生和人情味，這與我後來遇到的共黨份子那種兇惡詭詐的情形有些不同。這也許是共黨當時初立不久，參加的人還不曾受到蘇聯那種特殊的教育和訓練的緣故。

我在九人的審查委員中，也許因為年紀太輕的關係，有時不免過於天真，每遇爭論的發生，總是肆無忌憚一馬當先，和李大釗、于樹德二人弄到難分難解。現在回想起來，也自己覺得可笑！應當爭的地方固然不可輕易放過，不應當爭的地方又何必予人難堪，自討麻煩呢？不過這類的事，只有天真無邪的青年人才做得出，而青年人的可愛處也許就在這些地方吧！

宣言分三章，第一章為分析中國之現狀，第二章為闡述國民黨之主義，第三章為國民黨之政綱。政綱分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兩部份。對外政策共七條，對內政策共十五條，合為二十二條。宣言中把主義和政綱分得太顯明

，實則在宣言所附的政綱，即對外與對內兩項政策，在原則上此處所指之政綱即是政策。幾十年來在國內外有一極模糊的觀念，即為主義、政綱、政策三者，往往弄不清楚，其原因第一是因為宣言中的政綱實際就是政策，第二是宣言中所舉本黨的主義實質上就是政綱。但在一般的政黨很少有拿主義來標榜以作號召的。我之所以說宣言中的本黨的主義就是政綱是有所依據的：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總章中，首言：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創立，特制定中國國民黨總章如左：

第一章 黨員

第一條 中國國民黨，不分性別，凡志願接受本黨之黨綱，實行本黨決議，加入本黨所轄之黨部，依時繳納黨費者均得為本黨黨員。」

很明顯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誠然是國民黨之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創立為國民黨之黨綱，亦即是政綱，各時期所宣布和所實行的對外對內的主張，便是我們實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政策。由於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沒有把主義即是政綱，而政綱實際即是政策的話說明白，難怪後來不免產生出若干的爭論了。

五、反帝國主義綱領的爭辯

在宣言審查會中爭執最大的是民生主義和對外政策。民生主義所發生的爭議屬於主觀的組織的排他性而產生的居多，屬於理論上的爭辯並不如我們想像之大。換句話說，當時很自然的發生一種感情作用和成見，那便是國

民黨和共產黨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政黨，因此民生主義不是共黨所信奉的那套共產主義。這一爭議和成見，隨即影響到大會的空氣，我們和共產黨之間的鴻溝頓然清清楚楚地劃分出來。等到二十一日那天下午，第一次宣言審查報告提到大會之後，總理爲平息會場中此一爭議，特別對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說作一說明。

經過總理一番警關的解釋之後，大家的情緒和會場的空氣才從陰霾四佈中趨向明霽。本來可以即刻把宣言審查報告提付表決順利通過的，但總理爲增加衆人的理解起見，特又指定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大會前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把全案重付審查，再提請大會通過。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總理處置大事的慎重和對於羣衆的領導，重在真理的尋求和理性的發揮，並不以急於獲得羣衆一時感情的衝動和盲目的附和擁護爲滿足。

宣言經過第二次擴大審查之後，在二十三日的下午，便提交大會通過。

在宣言審查會中爭辯最烈的是：

- 一、關於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取消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的反帝國主義綱領部份。
- 二、是關於民生主義中土地農有的部份。

這兩項問題在宣言的原稿中都有明確的規定，都被我一力爭予以改變，或刪除，弄得面目全非。這件事至今想起來真是幼稚得可笑。當時參加審查委員會的九個人，當中只有我一個人還健在，其餘的人除了于樹德不知所終以外，餘皆作了古人。這一段經過如果不由我忠實地把它敘述出來，以供研究近代史的一項參考，在我而言，是會感到歉疚於心的。我時時鼓勵青年人要天真，坦率 and 勇敢，我現在雖然已不復是當年的樣子，却是當年那種青年人的精神，我仍然覺得十分可貴。自己的錯誤可笑，由自己傾吐出來，作爲後人的一個借鑑，總不能說它是一件無意義的事吧！

現在先談我反對把反帝國主義綱領容納在宣言和政綱中的理由和經過。關於收回租界與外人租借地，收回海關與廢除不平等條約，我反對的理由不是因為我沒有膽量，而是由於我立論的出發點是從常態的政治情況，而忽略那時是一個革命大時代的創始。在這一點上不僅我的認識不夠，就是胡、戴諸先生和專門以搗亂為目的跨黨份子李、于二人也看不清楚。不然他們不會那樣輕易的被我的道理所壓倒，一致同意把那些反帝國主義政綱的原意在審查會中沖淡或刪除。我所持的最大理由是：

一、西洋的政治家有一個信條，就是寧可失敗，而不可以失信。一個健全的政黨也應遵守此一原則，如果一個政黨把做不到的事作為對國民的一種諾言，來爭取他們的同情，問題不發生在說話的時候，而是在不能實踐諾言的場合，必定失去國民的信心，永久都不易收復回來。今天革命環境的艱苦和我們力量的薄弱，對於明明做不到的事情，又何必把它作為眼前的主張，招致後來失信的後果呢？所以我認為凡是做不到的事，最好不說，要說的我們必定要做到。這樣我們才能建立起國民對我們的信賴。全國代表大會既然決定每年開會一次，把這一類的問題留到力量充實，必可做得到的時候再行提示出來，豈不更為妥當？

二、假定我們現在一點憑藉都沒有，毫無責任地把這些主張提示出來為難反革命的北洋政府，倒不失為一種想法。問題在我們現在治理的區域內，近在咫尺間的有沙面的租界和粵海關，再如香港、九龍和廣州灣，這些地方不是英國的租借地，便是法國的勢力所在。對這些現實的問題，難道我們可以採取有效的行動，我們能够使國民相信我們所說的不是謊言嗎？

三、我們必須認識，政治問題離開了現實，而僅是空言便將招致後患，我們不得不在此加以考慮。我們檢討一下今日的革命環境，除了廣州一地微弱的力量之外，華僑所在的地方，便是帝國主義的根據地。我們把反帝國

主義綱領提出之後，首先受到摧殘的必定是海外的黨部，我們將未受其利而先蒙其害，聰明人豈是如此的作法？我是代表加拿大總支部來出席大會的，這樣有關海外黨務和同志利害的大事，我不能不嚴重的提請各位同志注意。假定各位不採納我的意見，本席保留在大會的發言權。

我上面的話理直氣壯，好似把大家說動了，却是李大釗很生氣的說：

「你既然要在大會去發言，我們何必要有這一個審查委員會？你應當有服從多數的精神。」
因為李大釗說話的態度不好，我很氣憤的反擊他道：

「審查會的決定不是最後的決定，他的性質是因為大會的人數過多，不易作精細的考慮，所以才成立審查會，由人數較少的審查委員作一精細的研究之後提供大會參考。爲達到此一要求，所以在民主國家的議會對於審查報告採取兩種辦法：一是多數的報告 (Majority Report)，也就是審查委員會多數決定的意見；二是少數的報告 (Minority Report)，也即是在審查會中反對者的異見。爲什麼要如此呢？這就是說：大會要知道審查會中正反兩方的意見，來作詳密的討論和決議的參考，你知道這是民主國家的一種良好的制度嗎？」

我說話的時候似乎顯得十分得意。李大釗回答說：

「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我們不屑於採取！」

我用很重的語氣對他說道：

「你所說服從多數也是資本主義國家表達民主的方法，那末你又何必要我服從？」

話說到這裏，彼此的情緒已經很壞，而我的詞鋒仍然很尖銳的繼續下去！

「資本論是共產主義的聖經，馬克斯寫這書的時候，最早是用德文、英文出版，研究共產主義的人是否因爲

德國英國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就連資本主義的文字都不讀了嗎？這樣的人還配得上稱為馬克斯主義的學者嗎？無怪一些讀了幾本東抄西竊，一知半解的中文小冊子的人，也要冒充共產主義的專家！」

李大釗不甘示弱的說：

「你這種言論和一些外國崇拜教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樣的可笑，這些人的意見以為不懂洋文，就不能做一個學者，哼！哼！」我跟即答道：

「這是五四運動初期的北大校風，與我無關。」

李大釗此時的神情很難看，會議大有繼續不下去的模樣。我現在回想起這段事，何以李大釗對我所說的話那樣感到憤怒，其原因是李是當時一般人所稱頌的共產主義學者，同時他又曾任過北大圖書館的職務，我前面所說的一些話，在他自以為好似都在諷刺他。

最後胡漢民先生以主席地位發言，他說：

「你們的話說到題外去了，就此停止吧！我們仍然回到本題的討論上。」跟着他提出了一個折衷意見，他認為大會海外黨部的代表人數很多，海外黨部自有他的困難，如果我們此時把收回租界，收回海關等反帝國主義的綱領太明顯具體的拿出來，的確影響很大，而在目前本黨的地位也不無顧慮之處，所以他主張：

一、把關於反帝國主義的政綱條款說得籠統抽象一點，不必太顯明的提出。

二、大會代表意見很多，「少數報告」雖然是很好的辦法，但是因為大家現在還沒有這個習慣和了解，此時還是以暫不採用為佳，以免反而引起大會許多問題來。

大家一致贊成了胡先生的主張，於是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反帝國主義的政綱，便被抽出

而代以籠統抽象的詞句。宣言審查報告於一月二十三日提到大會，沒有經過多少討論便由大會予以通過。

戴季陶先生在抗戰勝利後的南京，一天談到共產黨猖獗的情形，忽然問我，說道：「你當年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問他此話何所指，他說：「我想起你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對跨黨份子那樣的有成見，現在看起來，你當時是沒有錯的。黨時你那種蠻橫的態度，正好似俗語所說的初生之犢不畏虎，不僅李大釗、于樹德兩個跨黨份子受不了，就是展堂先生（指胡漢民先生）也把你無可如何。轉瞬又是幾十年，現在你都兒女成羣了！」言下似乎不勝其感慨。

勿論如何，我至今對李大釗、于樹德兩位先生的學養，仍表示其懷念，因為我後來所見到的共黨分子，多半是粗線條的土匪作風，不似他二人那樣的溫雅！

六、限制跨黨案的提出與爭辯

在總裁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第二十六頁第八節中曾有如下的記載：「在大會中（指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方瑞麟、江偉藩、黃季陸等提議，在黨章中加一條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我是當日當事人之一，特檢出舊時日記加以整理，敘述此事之經過，以供治近代史的人作一參考。

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激起了很大的爭辯，而又為我所親自參與者，有三個大問題：一是關於大會宣言審查之爭辯，因為我是宣言審查委員之一，共黨委員李大釗、于樹德便成了我們爭辯的對象；二是本書中所言之不許跨黨案；三是我所提的「採用比例選舉制為本黨政綱之一案」，爭辯的對方則為共黨分子毛澤東、韓麟符等，回憶起來已不覺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四十五年的時光在歷史的過程中是少乎其小的一回事，而在一個人生的歷

程中則不算得是一件很長的歷程了，當日所爭辯的問題，在這四十餘年以來，幾乎已演成一不知底止的世界洪流，此一洪流終將被人類的智慧所遏止，以奠定人類和平幸福的基礎，當屬必然的。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不許跨黨案的爭辯，是容共問題呈露出裂痕的一個開端，今日盤據大陸的共黨頭子毛澤東在這一次爭辯中便已初次露面，我現在把當日經過的實際情形加以敘述，或可以爲總裁書中所示此一事件之重要性作一說明與參考。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是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在一月二十八日的上午，大會的議程是「總章審查委員會的報告」，主席胡漢民先生宣佈開會之後，即由汪精衛以審查委員會主席的資格提出報告。本來在大會開幕之前，有一部份老同志如林森、鄭澤如、謝持、方瑞麟諸先生和海外代表們，即已對滲透在黨內的共黨分子有所懷疑，曾在廣州太平沙一個住宅裏舉行過好幾次談話會，預備對於共黨分子加入後有所取締防止。大會開幕之後，本來預備好了一個提案，因爲要推出一個資深望重的同志做提案人，而資深望重的人，又因顧慮多，遇事審慎，一要他自己當先，却又謙虛遜謝了。要由年輕的同志出馬吧，又怕資格太淺不孚衆望，所以到了大會開幕之後第九天還不會將此案提出。我當時是竭力想促成這一提案的人之一，幾次三番我都自告奮勇，把提案的責任擔起來，却不爲一般同志所重視，無已，只有忍在心頭待機而發。

當汪精衛作了黨章審查報告之後，大會代表方瑞麟即請求發言。他提議應在總章第一章第二條之後，增加一項條文爲「本黨黨員不得加入其他政黨。」他的理由是一個黨員只應有一個黨籍，如果有了一個以上黨籍的，便須脫離一個，因爲那時的共黨分子才是兩重黨籍，他們加入了國民黨之後，而仍然維持了共產黨的黨籍，我們那時指這般人爲跨黨分子，跨黨分子在此一提案通過之後，必須在下列兩條路當中選擇一個：一是脫離共產黨的黨

籍，二是脫離國民黨黨籍。那天的大會主席胡漢民先生，他以主席的地位諮詢大會無附議？於是附議之聲四起，本案便獲成立，由主席交付討論，辯論便自此開始。

好似共黨事先早有準備似的，共黨首領李大釗便以黨章審查委員會委員和共產分子的代表地位要求發言。於取得發言地位之後略謂：

「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黨員，此次偕中國共產黨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加入國民黨，是爲了要遵守國民黨的主義和黨章，來參加國民革命事業，絕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爲共產黨，乃是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革命事業……」

「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立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

他說話非常動聽，同時並散發書面說明，他在事前早有準備是很顯然的一件事。由此可以知道在大會開會前與開會中，對於共黨排拒的暗流是如何的早已在醞釀着。不許跨黨案的提出僅僅是揭開此一問題的序幕，而李大釗的聲明正是在針對此一事實，企圖用共黨笑臉來緩和當時的局勢而已。他繼續着說：

「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爲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爲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革命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

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本黨總理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爲，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

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守遵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

李大釗的話委婉動聽，好似聲淚俱下的神情，爲使大會一部分代表爲之動容，會場情形幾乎頓之逆轉。我是支持方瑞麟提案的一人，當我正要請求發言企圖把會場空氣扭轉的時候，葉楚傖先生已先取得發言地位。由於當時容納共黨分子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已爲既成事實，加以李大釗的笑臉陳辭，楚傖先生的發言雖然沒有明顯反對限制跨黨份子的主張，却也未曾對於主張限制跨黨的人有所聲援，因此他的發言影響大會的地方並不甚大。

七、第一次看見毛澤東的面孔

最可惱的是汪精衛再以黨章審查委員會主席地位繼楚傖先生之後取得第二次發言的機會了。他說話儀態萬千，語言清晰而富感情，辯駁中少有刺激，真得了「態度誠懇，措詞委婉，罵人不傷心」幾句善說辭的人的真傳了。

當汪精衛二次登壇發言時，他首先聲明他不是以個人資格發言，而是以黨章審查委員會主席的地位，應向大會作一真實的報告。他的態度謙和，使得聽他說話的代表，先已感覺到對於此問題非常客觀，話未聽完已受了他的影響了。他根據本黨的歷史引古證今，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他的大意說：

「從前吳稚暉、李石曾、張溥泉諸先生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已承認他們爲本黨的黨員，而且承認他們是德高望重的本黨的骨幹。爲什麼我們今日要不許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來爲革命而奮鬥呢？這不是我們前後的主張不能一致嗎？我記得有一位同志有一句很警惕的話，他說：或許有民族主義者不贊成民權主義或民生

黨中的共黨分子，究竟服從他們自己的決議，遵守他們自己黨的紀律呢？還是維護他們共黨自己的利益呢？還是維護本黨的利益呢？這很顯然是二者不得而兼。他們忠於本黨則違背了共黨的意志，忠於共黨則違反了本黨的意志，這情形不加防止，定必造成未來革命陣營中的大混亂。他們爲求有所貢獻於本黨而加入，將因此種情形而無所貢獻。

退一萬步言，即使共產分子加入本黨得維持其原有黨籍，本黨已容納在前，不宜於此時有所變動，難道我們不能限制本黨原有的黨員不得加入其他的政黨嗎？因此我主張修正方瑞麟同志提議，作爲禁止本黨原有黨員只能有一個黨籍，不得加入其他政黨。李大釗先生既代表共產分子聲明加入本黨爲的是有所貢獻於本黨，我相信我此一主張既不影響他們加入本黨既成的事實，而只在限制本黨原有同志，不得再加入其他政黨跨兩重的黨籍，他們應當諒解的。」

我的話剛才說完，廖仲愷先生便起來說出一番事實和理論來不贊成我的主張。會場空氣此時雖略有轉變，而反對跨黨者竟無繼起發言的人。不料廖先生發言之後，主席胡漢民先生離開主席的地位，請求林子超先生暫代主席，發言反對我的主張。大勢如此，實已無可挽救了，廖、胡兩先生發言的苦衷，其意則以爲容共是當日總理迫於革命需要的一項既定政策，深恐爲我這一少不更事的人所阻撓，而總理當日又不在會場，故他們不得不力加制止。其實在事前我曾將上項意見向總理陳述過，他當時雖然沒有表示接納我的意見，却並沒有明顯表示我不應作如是的主張。我在此當然不能妄說總理默認了我的意見，却是事實經過的確如此，我不能更有所增添。大約在民國二十二、三年的時候，我曾和胡漢民先生談及此事，胡先生說當時因爲總理不在會場，我事先又沒有把這事的經過告訴他，所以迫得他不得不離開主席地位說幾句話來反對我了。否則不許跨黨案若被通過，而總理又不在場

主義。豈有主張民生主義者不贊成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之理，也未有贊成民生主義者不贊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理。依兄弟的意見，我們的黨章上既有專條規定本黨的紀律，我們只應拿紀律來量度黨員的行動，合於本黨的紀律與否。任何黨員如果犯了本黨的紀律，我們便可拿紀律來制裁他。有了這一武器，跨黨不跨黨的問題，便可不必過於重視了，而且我們對於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既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在這一時間，又要起一變動，似乎是不該的。

再加以共產黨係一國際的組織，中國革命不能與世界分得開，我們容納國際共產黨的分子加入本黨來共同奮鬥，不惟不應反對，而且應當熱誠表示歡迎才對。謹將審查委員會和兄弟個人的意見說明一下，以供各位同志的參考，當否還希望各位同志指教。」

汪精衛上面這番話說完之後，會場的情形更加惡化，儘管他的話從嚴格的邏輯講來是不正確的，但在當時他此種似是而非的論調，的確影響了全個會場。這怎麼辦？難道這一件重大的問題就此結束了嗎？我當時心中很不安的在如此自己問自己。

我當時明知大勢已去，無可爲力，然而因爲我曾對方瑞麟同志有諾言支持他的提案在先，我就此默然而息，對同志是一種失信，對自己的主張爲不忠。更加以我自己在想，我是一個初出茅廬自海外歸來的青年，這是我接觸革命大問題的第一戰，如果我就此臨陣不前，此後還配得上在革命陣營中奮鬥嗎？於是我不甘示弱的繼汪精衛之後取得發言地位，我發言的大意是：

「共黨分子既是爲維護三民主義而加入本黨，爲什麼還要保持他們原有的組織？一個黨中有了雙重黨籍的存在，不是黨內有黨是什麼？他們雖然本心無他，假定將來共黨的紀律利害和決議與本黨相衝突時，在本

，他如何交待得了。

關於向總理陳述我此一意見的詳情，我另有一文詳述經過，在此不必細講了。

當胡先生把話說完之後回到主席的地位時，忽然在我的左後面有一湖南口音的人在報號發言。他大聲的在叫：

「主席！主席！三十九號發言，本席主張本案停止討論，即刻付表決。」

我聞聲向後端詳此為何人。見得此人穿一件薄棉袍，身材不算高，面色白中帶青，態度崛強，一股蠻勁，有似從鄉下初進城的人，看不出有多少君子風度。後來查明此人姓名，即今日盤據大陸的共黨頭子毛澤東，那時他還不甚出名，這是我聽見他發言的第一次。

最後由主席胡漢民先生將本案提付表決。主席說：

「贊成本黨黨員不得加入其他政黨，不必用明文規定，僅照黨章申明紀律者請舉手！」

結果：大多數舉手贊成通過。

自限制跨黨案被否決之後，於是共產黨分子的笑臉便第一次得以出售。自此以後本黨和共黨的衝突由醞釀而趨於行動，在海內外黨務的工作上，在各項民衆運動方面，在軍隊裏，共黨分子均利用其參加本黨的便利，而遂行各項奪取中國革命的陰謀。因此當總理在世時，乃有十三年六月一日廣州特別市黨部檢舉共黨分子案的提出，同年六月十八日中央監察委員謝持、張繼、鄧澤如諸先生又有彈劾共黨分子案的提出。自總理逝世以後，復發生西山會議分共的運動，十五年中央在廣州整理黨務案處理共黨分子的行動。當十五年秋，革命勢力擴展到長江流域，共黨更隨軍事的發展，更形猖獗，於是發生了寧漢分裂及十六年四月的全面清除共黨運動。最後更以蘇俄暗

中策動中國共黨在各地的暴動，於是國民政府斷然對俄絕交，關閉蘇俄在國民政府領域內的外交商務機構，俄共第一次在中國的笑臉乃暫告一段落。

八、比例選舉制案的爭辯與毛澤東二次的面孔

本節要記述的是民國十三年一月，我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提出「採用比例選舉制爲本黨政綱之一案」，從提出到被擱置的經過。就個人來說，它是給我深刻教訓的一次失敗。而究其實質則是民主思想、極權思想相撞擊而發生的一個巨浪，亦可說是民主、極權思想早期的分野。從這一提案的爭辯之中，我們就已看到毛澤東之流當時的一副橫蠻、狡黠的面目，這是與他們後來的諸多悖謬的行徑有其因果關係的。

一月二十九日那天的大會主席是林森先生。宣布開會之後，即由我以原提案人的資格到發言臺上作說明。

我那時對於會場經驗不夠，對於羣衆心理一點也不瞭解，我等於是作一專題演講或在對學生上課，整整的說了一個多鐘頭。大會主席林森先生幾次催我把話說得簡短點，我都置之不顧，代表們以奇異的表情來聆聽我的講話，究竟他們接受了多少，我一點也沒有考慮。我把世界現行選舉制度的弊害列舉了許多，把比例選舉制的歷史演進、派別以及其各自的優劣批評等等說了許多，最後才把我所主張的黑爾投票制(Hare System)的理由說出。我看會場沒有良好的反應，雖然還有很多話要說，一是因爲我說話的時間太久，二是我自己的興趣似乎受了會衆冷淡表情的影響，要說也說不下去了。最後只得終止我的說明，沒精打彩的走下臺來。主席隨即以本案宜付討論，於是在場代表紛紛報名發言，一場激烈的討論隨之開始。

發言代表約有十人，王愷、劉蘆隱是贊成本案的，戴季陶、劉伯倫是主張保留慎重考慮的，其他便是毛澤東

、宣中華一些共產份子堅決的對本案表示反對，而本黨同志中如王樂平、胡謙一些人，則均站在反對的一面。

爲了保存歷史的真實性，我特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上所載毛澤東、宣中華等的發言抄寫在下面：

「三十九號毛澤東說：『現時比例選舉制係少數黨所運動出來的結果。本黨爲革命黨，凡利於革命的可採用，有害於革命的，即應擯棄。比例選舉制有害於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採用比例選舉制即是予少數派以破壞革命的機會也。本席根本反對本案，因此本案不能討論，更不能付表決！』」

毛澤東發言的態度是如此的橫蠻無理，好似在和我吵架一樣。最可笑的是本案已經由主席宣付討論，在他發言之前已有王恒、劉蘆隱等幾位代表發言贊成，本案已經在討論進行中，而他却說本案根本不能討論。按照會議的常例，一個提案既然已經在討論中，無論你贊成與否，總得要用表決的方式來決定，究竟是贊成的多而把它通過呢？或是反對的多而把它否決呢？除了最後用表決的方式之外，再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處決一個提案了。但毛澤東說本案不能討論，已經是荒唐之極，而他更說本案不能付表決，豈不更是可笑、更是無知嗎？共產黨有一套祖傳的法寶，那就是武斷與無知，民主社會所習慣的一套表達民主的方式，共黨是從來不會尊重的。繼毛澤東之後站起來發言的是他同黨的宣中華，他說：

「比例選舉制乃資產階級騙人之物，本黨反對黃君提案。」

毛、宣二人交替爭着發言反對，我看情形不利便搶先取得一發言機會。我說：

「比例選舉制是實現全民政治的一種新的制度，你們可以不贊成，却不可以歪曲事實，說它是資產階級

的產物。它的作用在團結人心，糾合羣力，來發達民權。如果用之來團結革命力量，打倒共同的敵人，是無堅不摧，無敵不破的。因此比例選舉制的採用是利於我們革命黨的。如果你們一定要認為他有害於革命，那麼你們不是有意的胡說，便是一種可笑的無知。我要為比例選舉制呼冤！」

話說到這裏，我的情緒表現得非常的緊張，我對毛澤東、宣中華二人似乎是存了很輕視的態度。

我方把話說明，還沒有坐下來，宣中華緊接着站起來，又咆哮了一番，無可理喻的表示反對本案。宣中華還沒有坐下，毛澤東又緊接着起立發言，他們好似事先有了安排，用一種循環式的發言戰術把時間佔據，不讓其他的人有發言的機會，使得一個會場似乎只有反對的人，而沒有贊成者。共黨這一戰術，在以後的若干情形下，成了萬變不離其宗的用來佔據會場現持眾議的手段。在北伐前後，民衆運動方在萌芽時代，一般的講，民衆既無組織，又缺少經驗，共黨的確能善用這種有組織的技巧，以極少數的人，弄得對方頭昏眼花，無法對付，終於受其現持。

毛澤東大聲急迫的說：

「比例選舉制雖然為各國社會黨所採用，但只限於在沒有當權時是如此。若在取得政權後，便擯置不用，因此一制度實有害於革命之本身。如以自由給予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

他這一番話，說得真真可笑，他的座位離我不遠，我正擬向他質問究竟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比例選舉制是為各國社會黨所採用？有那一個社會黨在當權以後便把比例選舉制擯棄不用？可惜沒有適時取得發言機會。

毛澤東發言之後，會場情形頓趨緊張，正反兩方的代表都紛紛要求發言。最後由主席予戴季陶先生一發言機會，戴先生說：

「本席曾有見於本案之不能倉卒表決，故主張保留作爲本黨明年第二次大會後必須提出之案，因爲本案爲一新的政治主張，牽涉理論與事實極廣，大家對本案都沒有經過仔細的研究，我們以一年爲研究的時間，在下次大會時再提出討論較爲適當，請大家注意。」

繼戴先生而後發言的有劉蘆隱、王樂平、胡謙、劉伯倫等數人，除劉蘆隱之外仍屬懷疑本案者居多。最後由主席宣布討論終結，提付表決結果，以大多數贊成戴先生主張，保留爲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必須提出之案，本案便如此結束。

我時時向同志提及此事，深以爲是一種遺憾。不過採用比例選舉制案，雖然在歷次大會中未曾提出覆議，却是自民國十七年以後，本黨採行之單一投票制及限制聯記投票制，實際上已帶有比例選舉制的精神了。

其實當時正是一九二四年英國工黨第一次選舉勝利，由麥克都納(McDonald)起來組織內閣，而英國工黨在野時既不會有過比例選舉制之主張，組閣之後的工黨當然也不會有摒棄比例選舉制而不用的事實。毛澤東的話實在是閉起眼睛瞎說，這顯示那時他的知識，實在對這一問題是一無所知。由他的話可以看出一點，那倒是千真萬確，就是「如以自由給予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這就是極權主義的一個不可移易的教條。反對黨固然不應有自由、反對的意見，甚至凡是不相同的意見，在共黨政權之下，是不容許存在的。換言之，反對者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該死。他當日如此說，現在統治了整個大陸便是如此做。這是極權國家從蘇俄起便是如此一套的作法。今日民主世界與極權世界兩大思想的分野，便是在這一重要的基礎上發生其衝突。在民主的世界唯一可寶貴的原則是：反對的意見和不同的意見，不僅不會該死而且可以並存。反對黨的存在，更爲民主政治能敏活運用的一個重要關鍵所在。老子有一句名言：「萬物相生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倒是對今日民主政治真諦

的一種深刻的了解的說法。中國的哲人，在幾千年前便已體會到今日世界民主政治的真諦，可見民主畢竟是人類所需要的真理，合於人性要求的良好制度。極權國家的謬誤，是把反對的意見和敵對的意見等量齊觀。所謂反對與敵對的意見的區別，前者意見主張的不同，在公平、對立之中可以獲致和諧、協調，後者則是以武力暴行抹殺對方，有我無人的專斷行爲。所以極權便是一種暴政，既不容許不同意見的存在，更不容許反對的政黨的並存。毛澤東當時的發言真是一語道破極權政治的真諦了。他以後的種種行爲便是在演繹當日他所發出的那句極權政治的老話。四十多年來，本黨和共產黨的鬥爭豈僅是一政治的因素嗎？這實在是一種帶有世界性的思想戰爭。這一戰爭的開端，遠在四十多年前，此一事例便已發其端了。

九、恭記中山先生一次寶貴的教訓

比例選舉制案未獲通過，我心中十分的過意不去。那一天又適逢總理沒有到會，究竟總理對於本案被保留後的意見如何，我是極想知道的。在我提出本案之先，雖然曾經請示過總理，又經過他點頭說「好」。但是我在大會發言一點也不曾把總理對本案的態度說出來。知道這事經過的同志，事後曾經責備我，說我如果當時把總理點頭說好的經過向大家提一提，本案的通過是不成問題的。我爲什麼不把總理對本案的重視向大家說出呢？其原因是：

第一、我生性不習慣假借比我更有權力、更有威望者的地位來便利我自己的主張而獲得人家的贊同。我以爲一個真正的道理，能够訴諸於大眾的理智與判斷所獲得的支持，當更爲寶貴。我這一見解是否正確我不敢說，因爲我生性如此，我也就如此罷了！我一生受了這一習性所召致的困難，不止此一次爲然，此後所面臨同樣不快的

事還多呢！

第二、我始終認定一個好的主張，要經得起大家的批判和考驗才算數，一個問題經過許多意見討論後而獲得的結論，他可以使此一問題被人更了解，更能使此一問題的解決趨於完整。古人所謂：「集衆思，廣衆益」便是這個道理。俗話所謂：「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也就是說羣體的力量勝過任何強者，所以我不習慣假借別人的權威來蒙蔽衆人，使衆人不能自由運用他的理智結成一個「衆智成城」的力量。尤其是我對敬佩的總理，我不願意以他的名義，使大衆對本案不是出於衷心的贊成，而是近於盲目的接受，損及羣衆對他的威望。本案雖沒有通過，而我內心却無絲毫愧怍的存在。

採用比例選舉制爲本黨政綱之一的提案被擱置以後，我很氣憤的去報告總理。我的話還沒有出口，總理便說：

「事情的經過我已經知道了，這完全是由於你太沒有經驗，不了解會場的心理所召致的失敗，好在只是擱置一年，在下次大會仍須提出討論，還沒有完全被否決。當前這一主張的採用並不十分要緊。」

總理說完後，很慈祥的帶着微笑望着我。我跟着即請問總理，何以本案是由於我自己召致的失敗呢？他說：

「會場的人數那樣的多，知識、年齡和興趣都不同，聽說你在大會說明案由的時候，從古到今說了一個多鐘頭，既不是講課，又不是說教，何必費掉如此冗長的時間使人感覺厭倦？」

我說：「如此複雜的一個問題，不詳細的加以說明，如何能使人了解？既不能使人瞭解，又何能使人衷心贊成？時間雖未免冗長，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總理笑了一笑，跟着說道：

「大會代表知識水準很不齊一，你必須抓着大家的興趣，使人感覺到你所主張的是無可反對，才容易使大家贊成你的主張。」

「那麼，有什麼訣竅呢？」我迫不及待的問。

「依我的意見，只要說幾句話，就可使大家無可反對。」總理深具信心的說。

「要用幾句什麼話，才可以使人家贊成呢？」我又問總理。

「你第一句話應當說：本黨信奉的是三民主義。我想不會有人反對這句話。」

「你第二句話應當說：三民主義當中，有民權主義，是不是呢？我想也不會有人否認這句話。」

「你第三句話應當說：要實行民權主義，必定要舉行選舉，是不是呢？我想也不會有人提出異議。」

「最後你再向大家說：比例選舉制是最新、最進步和最能表達民權的制度，我想大家聽了這番話之後，便不會堅決反對了，你說是不是呢？」

「因為你把話說得冗長囁嚅，使得大家厭煩，本沒有問題的倒反而發生問題了。」

我聽了總理這番教訓，不禁頓足失悔，才知何以我在大會說明本案時的用力不討好。如果照他這一指示作簡要的說明，我想比例選舉制被大會通過是不成問題的。這真是一個最足寶貴的教訓。我時時以總理這一教訓來規律自己，有時尚可勉強做到，有時仍然脫不了書生習氣，而在面對羣衆的講話時，往往把話說得十分冗長，難道說這真是俗話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嗎？

十、反帝國主義綱領的再提出

——廖仲愷先生在大會的臨時提案——

在一月三十日的早晨，大會還未正式開會，我因為有事須向大會秘書處接洽，秘書處地址在大會會場後面的樓上，當我正跳跳蹦蹦的走上樓梯中間時，廖仲愷先生正由樓上抱着一大包油印品由上向下走來，當他在樓梯上看見我的時候，他帶着幾分神秘的神情，很快的把那些油印品用手掩着，深恐被我看見似的。我為一時的好奇心所驅使，我問仲愷先生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做得如此神秘？他說：

「這件東西此時不給你看，你也用不着看。」

他一面回答我一面向下走，我很玩皮似的用手把他攔住，我說：

「既然如此神秘，我就非看不可！」於是我從他的懷中順手取過一張油印品，此時他的表情雖然不甚願意，也未十分拒絕，但轉變語氣很和善的說：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秘密，橫豎等一陣你也會知道的，先看看也無妨。」

我把那張油印品張開一看，原來是一份臨時提案，內容是要在已通過的政綱中加入下列三項：

一、收回租界。

二、在中國領土內之外人應服從中國法律。

三、庚子賠款當完全撥作教育經費之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對這一內容，很覺得奇怪，對廖先生說：

「這有什麼秘密，何必做得如此神秘？收回租界和廢除領事裁判權，我們在宣言審查會時業經詳細討論把它取銷，為什麼剛剛通過的案，又要把它推翻？你真太不民主了！」我此時不得不把在宣言審查會中反對本案的理由重復向廖先生提出：

「反帝國主義綱領，不屬於膽量的問題，而是我們說出了這些諾言，如果不能立即拿行動來表現，我們將失去國民對黨的信賴，信賴失去後，此後再有什麼新的號召就不會為國民所相信了。此次大會惟一的任務，是在建立國民對革命對本黨的信賴。假定我們此時有決心有魄力，真把收回租界當做一回事，我們便得先從近在眼前的沙面下手，把英國人驅逐出去。如果這樣做，我願為前鋒，作一個為收回租界而犧牲的英雄！」

仲愷先生對我所說的話，仍然沒有一點理由來駁倒我，他在無可如何中只得說道：

「不管他的，我們把它通過了再說。」

我最後向廖先生說：

「你如果不提收回租界和廢除領事裁判權的主張，專把第三項將庚子賠款全部移作教育經費，我倒非常贊成，此一主張拿出來之後，本黨在青年和教育界，一定可以爭取很大的同情，宣言政綱的原稿沒有把這一主張提出來，倒是應當作一補救的。」

廖先生對我的話不置可否，匆匆的走往樓下。我很堅定的告訴他，如果我的主張不被採納，在大會裡我一定要提出反對。大會中的海外代表最多，由於他們在國語的運用上，頗難自如，我無形中作了他們的發言人，因此我很有把握使他的案不能通過。廖先生聽了我的話之後，似乎增加了他對此一問題的顧慮。

大會在十時開會，由總理主席，宣布開會後當即向大會報告道：

「本日有一臨時動議，係廖仲愷代表所提，業經依法取得連署，依照會議規則應為議程之變更，贊成變更議事日程者請舉手。」

當即多數通過，於是總理乃請原提案人登臺說明。

廖先生把提案中所列的：收回租界、外國人在中國領土內應服從中國法律及庚子賠款應全部撥作教育基金等三事一一加以說明之後，可能是由於我的談話增加了他的顧慮，他的說明因此不够有勁，於是會場的反應顯得很平淡。當時有代表劉詠闡、沈定一、李希蓮、張秋白、李國瑞等人發言，起初僅在程序上對本案應否加入政綱或別為決議上討論，還不曾對本案作實質上的贊成或反對的表示。到了後來，會場的情形急遽的轉到對本案的反對論調，形勢頓形緊張。恰在此時我看到仲愷先生遞了一個字條到主席臺上，總理當即向會眾聲明離開主席的地位對本案有所說明。事後由當時在主席臺上的謝慧生先生告訴我，仲愷先生遞給總理的條寫的是：「會場情勢不佳，本案請總理自行說明。」當我正要求發言的時候，總理已經離開主席的地位發言了，總理說：

「本總理贊成把本案加入在政綱中，當宣言政綱起草之時，本總理即主張在對外政策中應把收回外人在中國的租界租借地、廢除不平等條約、外人在中國領土內應服從中國法律三事，明明白白地列舉出來。在前次通過的宣言審查報告，竟把這三件大事沖淡漏掉，實在是一件憾事。這件大事的補救是今後革命成敗的重大關鍵所在。在通過的政綱中對此雖然有一種概括的規定，但是不够明顯，不够具體，更不足以作我們今後革命的號召，一新海內外的耳目。本總理主張應當把這三件大事大書特書，然後本黨此次的改組才有意義。本黨革命的目的，第一步在求中國的自由獨立以實現民族主義，我們籠統的說，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自由獨立，大家尚不感覺有什麼顧

慮。一說到要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廢除不平等條約，大家深恐得罪了帝國主義，便戰慄恐慌起來了。大家想想，中國民族不能自由，是由於什麼原因？不能獨立又是什麼原因？難道說，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民族的束縛不解除，中國還有什麼希望可以自由？可以獨立？外人在中國的租界不過是一件家喻戶曉的事實，所以我們特別要把它提出來。……」

總理說到這裏情緒顯得很激昂，態度異常的嚴肅，語調也異常的沉重。他繼續說道：

「我在辛亥革命以前，便提出了收回租界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由於我們同志的認識不夠、膽量太小，都不敢贊成我。大家企圖在因應帝國主義的情況下，可以完成我們的革命，從民國建立以來，我們所得的教訓，帝國主義不是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愚蠢，可以放心我們革命的成功，對他們是漠不相關的。結果他們用一切的方法來阻撓我們革命的成功，他們幫助中國的軍閥來摧殘我們的革命，他們利用買辦商人來把持榨取中國的錢財，把中國造成今日次殖民地悲慘的境地！我們既不能討好他們，而同時又失掉民衆對於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有一明確的認識，這樣無目的無意義的革命永不會獲得成功的！」

現在因應帝國主義來謀革命的成功時代已經成爲過去了，現在是拿出鮮明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來喚起民衆爲中國的自由獨立而奮鬥的時代了！不如此是一個無目的無意義的革命，將永久不會成功！」

總理繼續說：「在民國初年，就曾經兩次公開主張收回租界：一次是在民國元年解職大總統職務以後到了上海，租界上的外國人和各國外交界的人士，在尚賢堂開會歡迎我，我便向他們提出了收回租界的主張。當時在場人士爲之一驚，引起外國報紙的攻擊和批評。一次是我曾經發表過中國革命成功後，必須收回租界的文章。」總理說：「當我提出了收回租界的主張以後，外國人表示驚異批評不足爲怪，而我們的同志和當時的中國上層人士

且皆瞠目吐舌，認為將惹起無窮的後患。大家要認清，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中國如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租界便不應當存在。外國人把中國的土地，當作他們的殖民地是反客為主，是我們中國人民的奇恥大辱！」總理最後總結說：

「因此，我們應趁大會將要閉幕的時候，趕緊把這一主張加入在政綱當中，本總理對此提案願為附議。」此時會場的空氣甚為嚴肅，有一、二代表提出總理對本案是否應為附議的問題，經彭素民、沈定一兩代表發言說明總理不僅有對本案之附議權，更有提議之權，不僅可以把此一提案內容加入在政綱之內，且可以提議不入政綱之內。

總理在同復主席的地位之後，徵求大會意見是否可以授權他修正文字將本案主張加入在政綱之內，會場頓即發生一片請付表決聲浪，於是總理以主席地位向會眾說：

「本案現付表決，贊成本案由本總理修正文字、加入政綱者請舉手！」全體舉手一致通過。

經總理修正後加入政綱內的文字，即為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對外政策項下的條文：

一、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

二、凡自願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為最惠國。

三、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訂，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為原則。

四、中國所借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範圍內，保證並償還之。

五、庚子賠款，當完全劃作教育經費。

六、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僭竊之北京政府，其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爲維持軍閥之地位，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債款中國人不負責還之責任。

七、召集各省職業團體（銀行界、商會等）、社會團體（教育機關等）組織會議，籌備償還外債之方法，以求脫離因困頓於債務而陷於國際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我現在回想當時會場的情形，如在迷夢中一般。我原始是堅決反對提出本案的，在討論之初，我數次想發言，都無機會。迄今聆聽總理一番議論之後，我胸中一切的疑慮，好似春天的白雪融化在陽光裡，從此使我對於中國革命有了一個新的了解和新的認識，我在宣言審查會中把收回租界那些主張刪去所持的理由，自此烟消雲散，自覺對革命的理解不夠，深自懺悔。回想我青年時代那種矜驕的惡習，真是幼稚得可笑。當聽到總理把本案提付表決時所說「贊成者請舉手」時，我的手不知是受了何等大的一種力量的支配，很自然的、自動的、輕輕的、高高的舉起來，衷心的表示贊同，表示折服。

的確，當時此一重大的決策，是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所造成中國革命的新頁，我們從因應帝國主義時代，走向了與帝國主義鬥爭，抓住了真正革命的敵人的時代的開始！據我事後所知，當宣言政綱通過以後，總理發現收回租界等明顯的革命綱領被刪除之後，總理曾很憤慨的說道：

「本黨此次改組，如果我們還不能把反帝國主義的綱領提出來，中國革命至少還要遲二十年才能成功，可歎！」

廖仲愷先生的臨時提案，也是由於上述總理的指示而爲之的。好在事後大會對於此一重大錯誤，獲得補救，否則中國革命所遭受的影響不知是如何的重大！

這一段回憶是我的懺悔，也是我的自白。

十一、事後的追憶

當大會聆聽了中山先生一篇訴諸理智與衷忱的說明之後，大家一致舉手通過，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有關對外政策的各款，就是經他整理後的文字。到了散會之後，多數人似乎又漸漸把理智消失，回復到我在宣言審查委員會中所呈的心情。這心情不是恐懼，而是惶惑。亦不純粹是惶惑，而是理解得不够深透，於是缺乏決心與勇氣，當時想到的問題如像：

- 一、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的國民黨本部，今後的活動恐怕要受到限制或遭遇困難。
- 二、海外的黨務工作，或將因居留地的政府之敵視而不便活動。
- 三、截留廣東海關餘款以充財政的來源，將因此而無望。
- 四、近在眼前的香港，英帝國主義恐將不與我甘休。
- 五、一個多月前的列強二十多艘兵船在廣州白鵝潭的示威恐怕又將重演。

上述這些顧慮，在大會之後一直存在於不少人的內心，雖然沒有人公開的提出，但在私人交談時，隨時都流露出一種不安和徬徨的情緒。這一情形，在現在說起來似乎覺得可笑，但在當時的一般人因為生息在列強的高壓之下已久，民族的自信心便不知不覺的陷於消失或麻痺。治歷史的人，必須要明白一項重要的事實，那便是不能拿今人所處的環境來衡量歷史事實發生時的情形。亦猶如不能拿前人的往事來衡量今人的一切行為一樣。因為古今歷史固有其共通之點，同時亦有其不同的背景，與支配那個時代的不同的力量。我們知道中國民族的自信心是

自一九〇〇年（庚子）義和團事變之後而愈益萎頓，而辛亥革命發生在距庚子之後僅僅十一年，民國十三年爲西歷一九二四年，距庚子年也僅是二十四年。而這二十四年的歲月中，一面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對中國人民的壓迫日益加重，使中國民族透不過氣來；一面又是中國各級政府官員深恐人民與洋人發生衝突或是教案的重演。在這內外交迫的情勢之下，懼外病便成了一種普遍的心理。改良派反對革命的大理由便是恐懼重蹈庚子義和團事變的覆轍，在一部份革命黨人的心理又何嘗不是存有這一顧慮。所以辛亥武昌起義和各次的革命運動最所顧慮的便是外交。要免於外人的干涉，便不得不首先容忍各帝國主義在滿清或民國時代的軍閥政府所獲得的既得權利，來安撫帝國主義的國家。當民國十三年反帝國主義政綱在大會中斷然通過以後，一部份人在心理上要感到惶惑，自屬意料中事。我在此必須舉出事實來加以說明：

趙鐵橋兄是大會出席代表之一，也是當時的四川實力派熊克武的對外代表，他對革命忠誠而勇敢，遠在丁未年就參加四川江安、瀘州和成都的革命活動，那時他還只有十六、七歲。到了辛亥年他已是京津同盟會的主幹人員之一，在天津發行的革命黨機關報民意日報便是由他主持。大會後他見到我就問我道：

「聽說你在宣言審查會中，曾很激烈地反對把反帝國主義的條款明顯列出來，爲什麼你在大會中不繼續表示反對？而且，我分明看見你在表決時高舉起手來表示贊成？」

「你有沒有舉手贊成呢？」我反問鐵橋。

「我亦是舉手贊成的。」他說。

「那末，你舉手贊成又爲的是甚麼理由呢？」

「由於當時聽了總理一番大道理，確實使我折服，更加上老頭子那種誠懇堅決的態度，使我十分感動，便不

知不覺的把手舉起來表示贊成了！哈、哈……」鐵橋說這話時既坦率而又熱情。我回答他說：

「我又何嘗不是和你一樣呢！」

我更進一步問他道：

「難道說你恐懼帝國主義的威風，而要表示後悔嗎？」

「那樣還配做一個革命黨人嗎？事到如今，只有跟着他老人家的後面拚命了！」

鐵橋兄真不愧為一個有風格的革命黨人，一個革命黨人中的勇士。他民國十八、十九年時擔任招商局的總辦，因為要本着革命黨人拚命的精神，不避嫌怨、不惜犧牲去整理垂死的招商局的業務，因而得罪了從前把持招商局務的集團，僱人把他刺殺在上海招商局的大門外。他真是爲了要整理國營的招商局，來對帝國主義壟斷的航業作一競爭，以挽回國家的利益而犧牲了。至今招商局還有一隻海船名叫「鐵橋」便是紀念他的。

上面所說與趙鐵橋兄的對話，是反帝國主義政綱通過以後，代表一部份人的徬徨不安的心理狀態。現在我要提出一項資料來說明總理要廖仲愷先生向大會作臨時動議把收回租界等反帝國主義政綱重列在大會政綱之中，當時總理對本案是如何的慎重和具有決心。

在鄒海濱先生的回顧錄中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每日開會前後（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理照例到校長室（當時的廣東大學校長室）休息。有一天，總理問我：『現在準備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你有什麼意見？』我答道：『這是合乎本黨的主旨，很應該的。』總理又問：『固然如此，但你不怕各國壓迫嗎？』我答道：『世界上一切事情，得其平然後才能安定。不平等條約固然不利於我，但有了這種不平等的事，大家都沒有好處。所以目光遠大的，不但不至於

壓迫，或者會有贊成的可能。」總理含笑說：「你算有膽量！」我反問：「難道有人不贊成嗎？」總理說：「他們有點看不到，因此不免有些顧慮。」這案在大會通過的時候，總理很鄭重地說：「假使不通過這點，那末大會就毫無意義。」

從海濱先生這一段回憶中，總理雖沒有指出沒有膽量、看不到、有顧慮的是些什麼人，但就我的感覺而言，至少我是其中的一個。

當大會閉幕以後，在各種集會的場合，「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喊得日益激烈。這樣的標語亦隨處可見。最初以冷靜的頭腦面對此一問題的人，也在轉變中。羣衆的意識和情緒，似乎都在奔赴這一目標而日益熱烘烘地激昂起來。的確象徵着一個新的革命時代的開始：——因應帝國主義的時代在結束中，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的新時代已經到來！我個人當時不知究竟爲了什麼緣故，心中好似有一塊大石頭懸掛着放不下來似的，我不知道我這種心理狀態，是由於對帝國主義的膽怯，還是自己對於這一問題的了解不夠？我現在回想起來，可能這兩種成份都有。爲了要更深一層的了解這一問題，於是時時向當時對中山先生思想主張都十分了解的幾位先生請教，如像胡漢民先生、廖仲愷先生、戴季陶先生等，我所急切要想知道的，便是中山先生在大會說明反帝國主義政綱時曾經說過：「我在辛亥革命以前，便提出了收回租界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由於我們同志的認識不夠、膽量太小、都不敢贊成我。」又說：「在民國初年，就曾經兩次公開主張收回租界：一次是在民國元年解職大總統職務以後到了上海，租界上的外國人和各國外交界的人士，在尚賢堂開會歡迎我，我便向他們提出了收回租界的主張。……一次是我曾經發表過中國革命成功後，必須收回租界的文章。」我問這些先生們總理在尚賢堂的講話他們是否在場？說話的詳細情形怎樣？他發表過的文章原文是否可以找得出來

？他們的答覆不是說記不大清楚，便是要我去翻查民國元年的舊報紙。天呀！那時的廣州情形可不那麼方便，圖書館雖然有，那家能存有十幾年前的整套舊報呀！最奇特的是：那時竟無一部完整的中山先生文集。可是在十幾年之後的民國三十年左右，在抗戰最艱苦的時代，我在四川居然編了一部較為完整的總理全集出版，其中許多材料都是從舊報刊上抄寫下來的。中山先生在辛亥以後有關收回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的資料實在不少，但他在尚賢堂的講詞和那篇收回租界的文章却付闕如。不僅我所編的總理全集沒有，就是在我以後出版的總理全集中也找不到，這實在是文獻上的一大遺憾。

我要追尋出中山先生辛亥以前收回租界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的文件的主要原因，是要糾正當時一般人對他反帝國主義主張的提出，認為是由於當時採取聯俄政策所致的錯誤觀念。我現在仍然要在此不厭其繁地敘述這一問題的原因，是由於直到今天仍然還有人存有這一錯誤的看法，如果不予以較為詳細的說明，這一種錯誤的觀念將會使研究近代史的人們難於見到歷史的真象而錯認了歷史的進程。

有一次我隨胡漢民、陳協之等幾位先生到廣州白雲山的能仁寺去遊玩，我又提出這一問題來請教胡先生，他馬上給我一個不大不小的釘子碰。他說：

「你對這件事提出來問我已經無數次了，我能答覆的都告訴你了；你為什麼一定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強迫着牡牛生仔？現在要知道的和要做的事情很多，又何必單在這件事上動腦筋？總理把人類的進化分爲三類人：一是不知而行，二是行而後知，三是知而後行。你就做一個不知而行的革命黨人好了。」

胡先生的本意是在和我開開玩笑，但我卻有點不能忍受。於是我很直率的回答他道：

「不知而行的第一流人物讓你做好了，我實在只願意做『知而後行』的第三流人物。因為現在是科學時代，

是知而後行的時代，我不能不求知而盲從」。此時，我頓感覺到胡先生白皙的書生面孔上好似吃多了酒似的紅起來，額角的青筋亦鼓漲起來了。他好像正想嚴厲地「回敬」我一句，但話到嘴邊又止住了。我趁着這一瞬間又溫和地向他說：

「現在一般人都誤會了我們新近通過的反帝國主義的條款是赤化，是受了蘇俄的影響，我們不把他原原本本的找出來是中山先生遠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有的主張，如何能使人了解呢？革命的宣傳靠標語口號，而不從研究真理、啓發人們的理智入手，又有何效果呢？我是剛剛離開學校的年青『毛子』，我願代替你們多做點此類愚笨的工作」。胡先生最容易生氣紅臉，事情過了，也就算了，從不把不快的事記在心頭。我看他此時的臉色，又回復白面書生的本來面目了。

十二、中山先生反帝國主義主張的淵源與論證

爲了要尋求原始資料來印證中山先生在大會的說明，經過了不少的努力，碰了不少的釘子，都無着落，最後只有直接去麻煩中山先生來求得解答之一途。事情很湊巧，大約是在民國十三年三月的一個早晨，我陪同由四川遠道經由雲南而到廣州的石青陽兄的代表何德方君及四川軍人劉成勳的代表林鏡臺君二人謁中山先生，報告四川的軍事情形。這位何君滿口的四川土話，言辭思想都凌亂無條理，而他的使命又不重要。至於那位劉成勳的代表林鏡臺却不失爲「劉水公」的代表。（四川人對只圖說話好聽而不兌現的人稱爲「水」功到家，劉成勳就以此得名。）他對總理說，劉成勳要以十萬銀元幫助總理作爲北伐的經費，總理回答他說，那倒不必了，在各省爲革命而奮鬥的同志都很艱苦，我現在無力幫助他們已經感到不安，那能接受他們的幫助呢？你替我打電報謝謝他，勉

勵他努力。

在短短時間的談話之後，他們便先行離去。我趁這機會請示總理，我是否可以利用此一時間，請教幾個疑難的問題。他說：

「今天早上正好沒有別的事情，你就坐下來講吧！」於是我得有較充裕的時間向總理請教，我發問道：

「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先生曾說關於收回租界的主張，民元在上海法租界尚賢堂，上海外國人士的歡迎會上曾經講過，並且曾引起外國報紙的嚴厲批評，不知先生的講詞原文是否有存稿或其他的記載？先生又說曾經發表過文章，不知這一文章現在尚能尋得出否？」

中山先生回答說：

「這些材料手邊現在都沒有，大約在當時舊報中可以尋得出。我對於此項主張不只發表過一次，當時外國人固然覺得不安，就是我們的同志，也頗以我的言論易引起外人的反感為慮。」

我聽了中山先生的話後，心中又冷了半截，如果當時廣州的圖書館存有此項舊報，我也不敢再麻煩他了。在一個研究設備欠缺的社會，研究問題尋找材料真是不易。而在歐美先進國家，他們有非常完備的圖書館供人利用，所以易於培養出專家學者，在國內却是難乎其難的。當時在國內出版物已經很少，而其所登載的文章幾乎很少有值得一讀的，不是「思而不學」，便是「面壁虛構」，不以事實為根據。原始資料在中山先生處也未能獲得，於是我不得不請問他關於是項談話及文章的內容了。於是我說：

「先生當日所持收回租界的理由和內容能不能告訴我一點？」他微笑着說：

「說起來很可笑，當日我曾經把日本、暹羅的前例告訴國內的人士，說明這在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很平常的事

，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就曾有過外國的租界，由於政治的進步，後來租界亦由和平的交涉而取銷了。可能是因為中國在庚子年八國聯軍之役受創過深，中國人對於外人的恐懼也特別利害。民國元年距庚子義和團事變為時僅僅十一年，一提到易引起外國人誤會的事便談虎色變，這亦是無足怪的事。辛亥以前一般從事革命的同志，雖然熱誠勇敢不惜生命的犧牲，但是最忌諱的事，便是怕被人把我們的革命誤會為排外的義和團，引起國內同胞的恐懼和外人的干涉。當日康有為、梁啟超那班君憲派，所持的反對革命的理由，便是認為『革命要召致瓜分』，我們駁斥他們的言論，亦只能從善意方面分析帝國主義的情勢說明革命是絕不會召致瓜分的。其實在我內心的籌劃，列強終將不會輕易聽任我們革命的成功，甚至要予中國革命以阻撓與干涉，亦是我意料中的事。外交關係我們的成敗很大，要免於這些困難，勢不得不因應他們，不能不在他們之間利用其矛盾以求得友軍，更不能不把革命被人誤會為盲目排外的義和團那種觀念洗刷乾淨。但是現在的情勢與以前已經大不相同了，所以我們要謀國家的自由獨立，便不得不把真正妨礙中國自由獨立的帝國主義作為我們今後奮鬥的目標。」

我聽中山先生說到這裏，就迫不及待地發問道：

「照先生的說法，當年在尙賢堂，聽你講演的那些外國人豈能甘休？這豈不是與虎謀皮、自討麻煩嗎？」
中山先生笑了一笑然後說：

「我當然在和他們講話的時候，亦注意到這一點。我是和他們講大道理：第一、告訴他們只有中國革命成功，他們的利益才得有保障。從前滿清的排外是由於政治腐敗，我們的目的是改革政治建立文明的政府。如果滿清的腐敗政府，繼續存在，野蠻的、排外的、義和團事變一類的事，是不會終止的。第二、是因為鴉片戰爭以前滿清採取閉關政策，不與外國通商交往，你們外國要到中國來做生意，便不得不用武力來打破中國關閉的門戶，滿

清政府在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戰敗之後才被迫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口岸准許你們做生意，才劃定地方給你們居住，這是租界的起源。當日的意思是：你們做生意只能限定在這租界以內的地方。現在中國革命已經成功，中國已成爲世界文明國家之一，你們放棄了租界，全中國各地都可以給你們通商貿易，這不是你們的損失，相反的是你們外國在中國貿易範圍的擴大。你們只要守中國的法律，全中國各地和各地的人民都會歡迎你們的。如此你們所失者小，而所得的却更大。第三、租界的存在，好似國中有國，侵害了中國的主權，你們在租界享受的種種特權，對中國是一種不平等，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中國人民對你們不會有好感的。你們不能得中國人民的好感，你們在中國的貿易是不會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的。」

我問總理：「先生的話在場的外國人聽後作何感想？他們有無反應？」

總理繼續說：

「明理的外國人是贊同的，多數的人當然感到不快，其後外國人在上海等地所辦的報紙，對此都加以攻擊，黨內外的人聽到外國人都反對這一主張，於是更瞻前顧後不敢有所作爲了。不然的話，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收回租界等等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至少早在十幾年以前便應大聲疾呼的提出來了，何至於遲延到今天才明白標舉出來作爲宣言與政綱。這一不幸的延宕是十分可惜的事。當然，從此下定決心勇敢的向這一方行走還不爲遲。今日國民的知識和國際的情形已比辛亥年時大大不同，進步得多了，做起來雖不無困難，但比以前不知容易了多少。十幾年前之所以沒有把反帝國主義的主張高喊出來，就是因爲辛亥革命後同志們的心已經渙散，信仰也已動搖。現在本黨改組，我們強化組織、堅定信仰，所以今後行之必易。」

我趁這一機會，把兩個悶在心中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問題向總理提出：

第一、辛亥革命南北統一之後，各國都紛紛承認我們，尤其美國是一個很早就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爲什麼到了民國二年（癸丑）列強便幫助袁世凱來對付我們革命黨，使我們二次革命竟很快的就失敗了？

第二、這是不是由於當日先生主張收回租界等等不利於列強的主張所引起他們的反感而對我們不利呢？

中山先生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我，略爲停了一下，好像說起來非片言所能說得明白，而又不能不趁此機會曉諭我一番。我此時亦感覺我的問話太坦率，修詞也不甚妥當，然而話既已說出口，又無從加以收回，只得靜候他老人家發落了。

中山先生說：

「你第一個問題是千真萬確的。如果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時，列強不右袒袁世凱而抑制我們，二次革命不會失敗，即使失敗，也不會那樣摧枯拉朽般的失敗。列強幫助袁世凱二千五百萬金鎊的大借款。這一筆大款給了袁世凱，不僅是一項有力的物質援助，而且更是一項精神的援助。在『懼外病』患得很深的當時中國社會，那時大家把我們國家的成敗休戚都寄托在外國人的喜怒與取舍之上，袁世凱一俟大借款到手之後，不僅財源有了依賴，士氣也隨之大爲旺盛，這的確是袁世凱之膽敢反革命和我們之所以失敗的主因。銀行團起初爲英、德、法、俄、美、日六國，後來美國政府宣言退出，便成了五國銀行團了。」

中山先生說到此地，又略爲停了一下，心情很沉重而又委婉的說道：

「至於說到帝國主義對我態度的轉變，是由於我主張收回租界的主張所引起的反應，在當時很多人都如是說，這是很遺憾很可笑的。我當時，甚至在辛亥革命之前，不僅主張收回租界，而且主張改善外人在中國海關的特權，以及收回領事裁判權，也即是我們今日要提出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反帝國主義的主張。今日的時代是進步了

，你看我們現在在南方高喊廢除不平等條約，北方政府中也有人在進行想循外交途徑來修改不平等條約了。在辛亥年的時候，我們何嘗不想在因應帝國主義的原則之下，用和平的方法來和列強打交道去修改不平等條約，但是如果做得到的話，就不用等到今天了。如果我們今天不高喊廢除不平等條約，恐怕北方政府中人到現在還不敢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由於他們這一表示，可見大勢所趨，廢除帝國主義加於中國束縛的不平等條約，只要我們努力，必然是水到渠成，最後一定成功。」

我說：

「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對外政策第一條說：『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應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北方政府用『修改』二字，如果在實質上能够把那些不平等的部分去掉，這與我們所主張的『取消』與『重訂』又有什麼分別？」

中山先生笑了笑，好似覺得我這一問題問得過於瑣碎似的，不過他依然很有耐心的說下去：

「從前我們本是希望由雙方談判協議而達到修改不平等條約的目的，因為列強根本不贊成這一主張，不願放棄他們在中國束縛我們國家發展的特權。同時中央政權一直由北方的舊勢力所把持，列強又不把我們當作交涉的對象，所以我們只得大聲叫喊，喚起國人的覺悟與了解，待我們統一全國之後再來實行。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黎和會和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我們都曾發動輿論，迫使北京政府在這兩次有關中國的國際會議中，把修訂不平等條約的事提出來。無奈北京政府缺乏勇氣，雖然曾經以很溫和的口氣提出，但由於不敢在會議中堅決的爭取，以致沒有得到什麼具體的結果。當然列強不願放棄其既得的權利亦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距今一年多以前，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本黨發表的宣言中，曾提出一項主張云：『力圖修改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根據這一條款，我們的態度仍是十分溫和，仍然是主張修改，但是在民國十二年十二月裏，我們爲了要截留廣州的關稅，不要使在廣東徵收的關稅由外人的稅務司交給北京政府用來作打擊我們的軍費，不料列強竟派了兵艦二十餘艘到廣州珠江的白鵝潭示威，把砲口對着我們的大元帥府，要迫使我屈服。這二十餘艘兵艦中竟有對我們革命較爲友好的美國和法國在內，他們都各出了兵艦二艘，參加帝國主義的行列。這是我所最引爲遺憾的，但我並不因此而屈服。

因爲修改不平等條約是要得到對方列強的同意的，我們既不被他們認爲對手，而他們又根本不願放棄他們在中國的既得權利，所以我們只好單獨叫出取消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等到他們感覺到有必要時，再來重訂雙方互尊主權的條約了。我們在南方高叫取消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所以北方才敢於主張修改不平等條約，不怕帝國主義的干涉和威脅了。」

中山先生此時的神情十分嚴肅，我聽了他最後一段話，因而想起李曉生對我說過的與此相彷彿的一段話來。李先生說：

「在辛亥革命以前，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諸先生在巴黎出版一種革命的刊物名叫新世紀，鼓吹無政府主義，言論非常激烈，要我爲他們在各地多多推銷，我以此事請示中山先生的意見，他說：『你儘管盡力爲他們推銷好了』。什麼理由呢？中山先生說：『我們主張革命，大多數人說我們是激烈派，聞之恐怕得要掩耳而走，新世紀的主張比我們更激烈，讓多數人知道了，會感覺到我們是很溫和而不掩耳而走了。』」

由這一事例我們不難知道中山先生的器度和胸懷是如何的恢宏！

中山先生最後很鄭重地答覆我前面所提的由於他在民國元年提出反帝國主義的主張，而引起列強對我不利的第二個問題。他說：

「處理問題應當把握住問題的關鍵，亦即是問題的根本的癥結所在，政治技術上的因應和規避，固然在某一時期內或多或少可以減少若干阻力，但到了盡頭，問題的根本癥結仍然是存在而無可避免的。我們的革命是在謀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自鴉片戰爭以還便爲帝國主義所摧殘、所掌握、而日益加深。我們既不能希望腐敗的滿清政府，把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所以我們才決心要革命推翻他。推翻滿清是我們革命的第一步，從帝國主義的壓迫束縛下解救出來，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當時誠然有不少人認爲列強幫助袁世凱來對付我們，是由於我發表收回租界的主張所致。但是，這只是一種淺薄的看法，其實就是我在民國元年不如此主張，帝國主義亦不會輕輕放過我們。除非我們放棄革命的主義，依託在他們的羽翼之下，犧牲我們國家的獨立自由，幫助他們加深中國的殖民主義化，也許他們才會在袁世凱和我們之間作一個選擇。

要明白這一道理，我們對列強過去的對華政策，必須有以下的幾項認識：

一、列強對華的基本方針，永不願中國的強大而造成他們自己的威脅。中國的文化悠久，人民衆多，資源豐富，一旦強大起來必將會無敵於天下，所以我們在滿清腐敗政府的統制下，中國不能振作的時候，他們猶說中國是一隻睡覺的獅子，他們叫我們是『睡獅』，一旦這一睡獅醒過來，便會吃掉他們了！而革命正是喚醒睡獅的激烈行爲。

二、他們企望於既得權利的保持，而不能寄望於一新興的謀求國家自由獨立的革命政權，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中山先生爲我舉出兩個歷史的事例，他說：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是最早接受西洋的宗教思想，想在中國建立一個西方宗教式的帝國，但是當日的列強並不切實援助他，反而去援助相反的滿清腐敗政權。宗教上的接近並不能改變一個國家的自私政策。英國的戈登將軍一班人並且組織長勝軍來打擊太平天國，造成他們的覆亡，這是一個明證。」

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及因此役而訂立的北京條約，是在英法聯軍攻占北京之後，迫使滿清政府作城下之盟，又何嘗不是英法兩國威迫滿清政府如不屈服便要幫助太平天國而締結的呢？滿清政府這一次的屈服所要贏得的便是幫助他來對付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雖多，這應當是其失敗的原因之一個。爲甚麼當日英法兩國要如此呢？一是不顧中國的強大而威脅他們；二是要保持他們的既得權利於不墜。在新興的太平天國與腐敗的滿清之間，他們選擇了後者就不足怪了。

其次，是庚子義和團事變之後，列強並不追究懲辦慈禧太后那位禍首，反而不惜多予保全使其回鑾北京重掌政權，這說明一個國家的腐敗政府的存在，在侵略國家看來是於他們最有利的。更何況當時的一班大臣們，亦不願朝廷有一個更生的局面出現，革命固然是他們所痛絕的，就是改良派的康梁之徒在利害上亦與他們相違背。

所以，在民國元年的時候，不是因爲我把收回租界的主張提出得太早，以致引起列強的反感而不利於我們，而是那時我們革命組織鬆懈，人心渙散，信仰不夠堅強，否則我們不會延誤到今天還沒有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家。」

中山先生很感慨地說到辛亥革命時的情形：

「辛亥年滿清既倒之後，我看到革命黨人組織鬆懈信仰不堅，誤以為革命已經成功，憧憬於民主憲政的實施時期已經到臨，一切都不照革命方略來進行建設。軍事時期還未完全結束，便想一躍而實行憲政了。我當時感覺到同志們的心已渙散不足與有為，所以決心暫時先結束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政體，而把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以暫謀南北的統一，一面專心修築二十萬里的鐵路以解決交通問題，以謀經濟之開發，實業之振興；一面從事教育文化的發展以增進人民的知識水準，待時機成熟再及其他。

我這一企圖，在袁世凱方面表面表示贊成，內心則認為是一項空想不予重視。而在列強方面則已暗中蒙上一層陰影，覺得中國的進步和革命的成功終歸是與他們不利的，而進行其『扶袁倒孫』的大借款陰謀。自民國二年春天袁世凱僱人刺殺宋教仁於滬寧車站案發生，同志們感情極為衝動，主張再舉革命討伐袁世凱，我在初對此頗為躊躇，然以袁世凱背叛民國之罪行已顯露其端，再舉革命已勢不可止，不得不對同志們的義憤予以同情。我當時的看法，如果要再舉革命討袁，必須在他大借款未成之前舉事乃可操持勝算，不意我們行動遲緩，迄至袁世凱大借款成功之後，贛、寧、粵各地才紛紛被迫起義，以致不旋踵而被袁世凱個個擊破，二次革命便因未能掌握時機而遭致慘痛失敗！這一次本黨的改組便是要力矯過去革命之慘痛失敗，重整我們革命的旗鼓！」

我前面所述說民國十三年的一些回憶，是在說明當日中山先生強調提出收回租界，收回海關的主權及反帝國主義的種種主張，是遠在辛亥革命時便已經提出，並不是因為民國十三年聯俄的關係才有是項決策的。這是治近代史的人難於了解亦是易於錯誤的問題。這是近四十年代國民革命歷史的轉捩點，忽略了這一背景，便不易了解問題的關鍵所在了。

民國十三年時的聯俄政策，是由於蘇俄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暫時脫離了列強侵華的行列，此時的蘇俄正

是被資本主義的列強加緊圍攻中。蘇俄爲了要解除他自身的危機，突破列強的包圍，於是不得不採取援助弱小民族解放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策略，來困擾資本主義各國，以獲得其政權的穩固。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是帝國主義角逐最強烈最迂迴而最脆弱的地區。因此蘇俄要以「聲東擊西」的策略來對付包圍他的敵人時，無疑的，中國是掀起反帝國主義高潮的最好的地帶。因爲這正是中國革命尋求已久的一項基本問題的解決。

蘇俄爲了要討得中國人民的歡心，於是首先聲明放棄帝俄時代在中國所獲取的一切權利。蘇俄的代表越飛於民國十二年與中山先生的聯合聲明並更進一步的強調：

一、蘇維埃制度不適合於中國。

二、中國需要的是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

三、蘇俄對於中國革命寄予同情。

從這一聲明的要點可以看出蘇俄是如何的在迎合中國革命當時的需要。中國在此一時期當然以聯合脫離了侵華列強陣營的蘇俄爲有利。蘇俄承諾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援助，更爲侵華列強歷來所未曾有的一項表示。反帝國主義以求中國的自由與獨立，這當然是於我最有利的機運，焉能輕輕放過？

這說明當時蘇俄的對華政策，在反帝國主義這一目標上與中國國民革命的利害有了共同之點而一時結合起來，假使到了利害不同甚至發生了國家利益的基本衝突的時候，自然也會斷然分解的。我們試檢查一下自辛亥以至民國十三年這一時期的列強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可以大體說都是維護中國的舊勢力而反對我們的革命。美國的政府和民間對中國雖然態度較好，除了民國元年首先承認中華民國與民國二年的不參加英、法、德、日、俄對袁世凱的大借款來打擊中國革命以及一九二一年在華盛頓會議中，對於山東問題之解決予中國以同情之外，也一直仍

未能擺脫英國和其他列強侵華的牽累而自拔。到了民國十二年冬，爲了中山先生截留廣東關餘的問題，各國派了二十餘艘兵艦到達廣州白鵝潭，以砲口對着距離不及千米的中山先生駐節的大元帥府示威的時候，美國亦竟派了兩艘兵艦參加了侵略的帝國主義的行列。中山先生素來盼望美國對中國革命作一個援助當初美國獨立的英雄，法國的拉法葉（Lafayette），但是到來的不是拉法葉，而是兩艘示威的兵船，這在中美兩國人民友好的關係上，構成了莫大的遺憾。

中山先生素來認爲可以爲中國革命之友的一是美國，一是日本。美國是一個經過革命而建立近代民主政體的先進國家，在民主的基本的原則上與中國革命的目的正相同，而兩國並無利害衝突之處，日本則是文化歷史與中國最密切而利害亦至接近，沒有日本的友善與同情，我們遭遇的困難當更大。事實上，美國在民國十二年對中國革命的態度既如上述，而日本方面除了民間志士同情我們，並曾有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的志士，但是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則始終與英國爲首的列強侵華政策完全一致。在這一情形之下，在此一時間之內，可以爲中國革命之友的便只有蘇俄了。這是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重振革命旗鼓，對蘇俄一時採取友好態度的一項重要的背景。亦是蘇俄那時的對華的政策符合了中國要在帝國主義的羈絆之下擺脫，才能獲得國家自由獨立的要求，而偶然結合起來的因素。是先有了中國國民革命不能與帝國主義並存的因素，乃有蘇俄乘機而助長之的事實。中山先生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在前，與蘇俄的合作是在後。

現在我很有必要，把遠在辛亥前後中山先生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利權，取消領事裁判權的重要談話寫在下面，作爲一項具體的歷史論證。

民國前一年十二月在巴黎，與政治星期報記者談話：

「……新政府於各國通商一層，更當注意。當廢除與外人種種不便之障礙物，將海關稅則，重行編訂，務使於中國有益，不能聽西商獨受其利。……」

民國前一年冬在滬與外報記者談話：

「記者問：關於治外法權如何？」

先生答：各種改革完成時，政府當立即取消領事裁判權。」

民國元年五月與土蔑西報記者談話：

「……言次，又謂：中國政府將取消各口岸之租界。

記者問：如此則沙面亦歸中國政府管轄之內矣。

先生答：吾儕將擴張沙面，與共和國全境無異。

記者問：英人在中國之權限，將與中國人之在英國者同乎？

先生答：必然！此是數年後之問題，吾人將取法日本。日本所有之外國人，皆受日本管轄，而吾人之政見，又欲極力保存國體。」

民國元年五月，在香港與南清早報訪員威路臣談話：

「記者問：先生言通商口岸之租界，定必裁去，此何故也？」

先生答：此乃華人之意志，謂吾人必要獨立者，更不願在中國而歸洋人統轄也。然吾人將必開放中國各地，以爲酬償。目下洋人，祇可囿於通商口岸，若果裁去各口岸，則洋人將可到通國各地，由太平洋以至西陲，果爾，吾料歐洲諸國必甚歡迎，因洋人所得利益甚大也。雖然，此事非欲即行，吾人將必先行自立妥善，使歐洲諸國

滿意，然後請其裁去口岸之租界，時機一到，料各國無有抗拒者。因各國對於日本、暹羅，既不相拒，豈獨拒於中國乎？洋人欲拓大上海租界，惟吾人不允，此乃當然之理也。譬如別國今居中國地位，豈不亦如中國之所爲乎？足下爲英人抑美人乎？若爲英人，則必不欲有德人租界於倫敦也明甚。」

民國元年八月，在北京與各報記者談話：

「記者問：聞先生主張遷都，確否？」

先生答：余極主張遷都，其地點或在南京，或在武昌，或在開封均可。北京乃民國首都，而東交民巷乃有大砲數尊，安置於各要隘，殊與國體大有損辱……。」

民國元年八月在北京談話：

「予不至北京已二十年，此次重來，未改舊觀。惟國都有外兵駐紮，城頭安置各國巨砲爲可慨耳！試思舉一國之首都，委之他國人代爲守護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余有遷都之建議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三十日三版

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

編印者：國

發行者：國

史

史

館

館

版權	所有
----	----

地址：臺北縣新店鎮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電話：九一一一五二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